

唐弢与茅盾往事钩沉

□姚明

1981年4月14日唐弢连续写就《侧面——纪念茅盾先生》《一件小事》《“待”“且”解》回顾了自己与茅盾1936年以来的交往情景，作为对茅盾逝世的纪念。两位大家有着半个世纪的交往。笔者查询了《茅盾全集·书信集》，发现收录的一千多封书信中竟没有一份写给唐弢的，而查阅《唐弢文集·书信卷》，收录有一封唐弢写给茅盾的信，时间落款为1975年1月2日，大致内容为接到了茅盾推荐的宋某的关于旧诗的解释的回应。书信往往是双向交流的，当时很多书信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两人的交往似乎在此中断，相应的历史细节也被淹没了历史尘埃之中。为此，笔者翻阅了茅盾日记，发现在日记中记录了诸多与唐弢的交往往事，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再现两位大家交往的故事。

关于《影梅庵忆语》一书的借阅往来

从1963年2月开始，茅盾日记中开始频繁出现有关唐弢的记录。

2月16日：阅报，写信给唐弢请代借有关《红楼梦》考证诸书。这些书大部分从前看过，但今天一些印象也没有了；

2月19日：九时半，唐弢来（托他借有关《红楼梦》的书籍，他把自己所藏亲自送了来）。十时许辞去；

3月4日：今日又从唐弢处借来《影梅庵忆语》及景梅九之《红楼梦真谛》。二书一为文学研究所藏，一为北京图书馆藏。晚阅书至九时，服药二枚如例，然而直至十二时许始有睡意，约半小时后入睡；

3月17日：十一时半，全家到四川饭店午餐，同时并约请罗髻渔夫妇及唐弢夫妇。盖本月六日小钢十岁（整十岁）生日，而该时我适生病，故于今日补请她也；

5月26日：前借唐弢之书，已经用完，包装后拟于明日亲自送去；

5月28日：八时送书还唐弢，并谈了一小时辞去。

由此可见，在三个月内，两位大家以包括《影梅庵忆语》在内的红楼梦主题书籍借阅为契机写了一封信，见了两次面，还在四川饭店补办小钢10岁生日宴，邀请了罗髻渔夫妇及唐弢夫妇，可见双方关系之亲近。

从1954年10月开始，广大的红学研究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1963年，为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相关活动，作为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先生接受了发言任务，为此从2月开始借阅《红楼梦》有关图书，而他最先想到的借书对象就是大藏书家唐弢。

借到相关图书后，茅盾先生仔细地进行了阅读与研究，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作札记。中午小睡一小时。下午

处理杂公事，作札记，晚续作札记完（按此项札记系自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六年有关《红楼梦》之评注解释、索隐等书之简明提要）。”

茅盾先生阅读了大量《红楼梦》的资料、研究著述及有关史料，抄、写了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并完成了论文《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发表在1963年12月的《文艺报》上。唐弢的藏书成为了这一段红学研究历史的重要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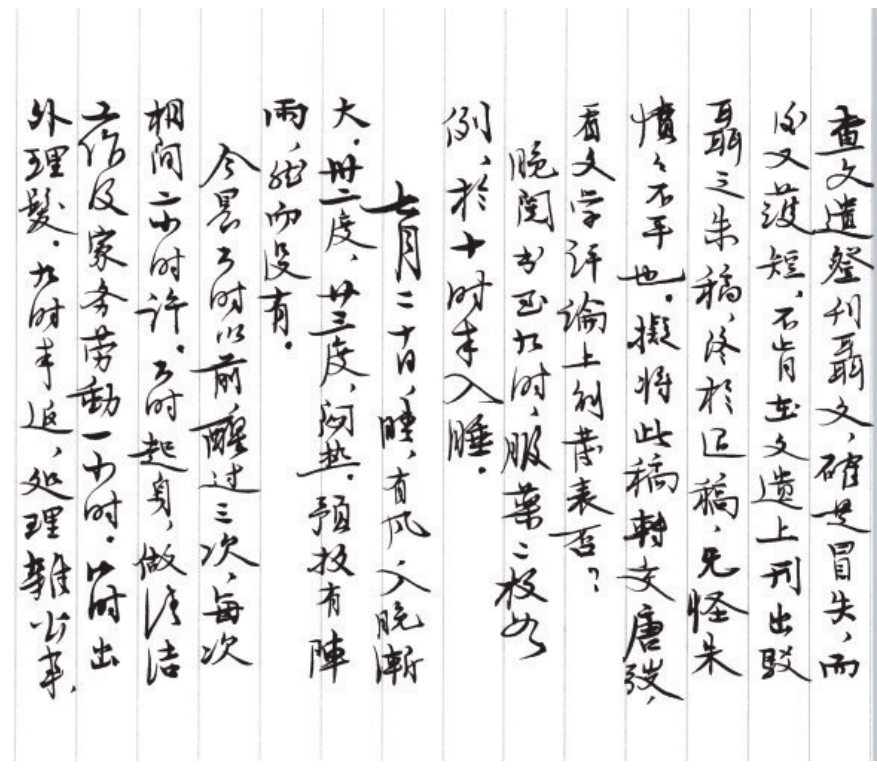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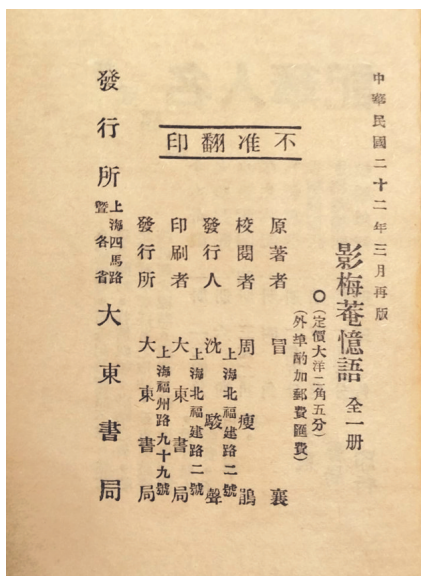
关于朱南铤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么?》的书信交流

1963年6月之后，茅盾日记中记录了关于红学家朱南铤一篇文章的事情。茅盾在6月5日完成了关于曹雪芹报告草稿的修改及补加附注两条，他致信张偕，请其即付打印，并提到只有四位专家提了意见，四位专家是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朱南铤，请张偕帮忙催一催未提意见者尽快提出来。现将7月19日到8月17日之间的日记摘录如下。

7月19日：上午阅报、《参资》，处理杂公事，中午小睡一小时，下午处理杂公事，阅朱南铤送来《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么?》一文，此为驳駁石樵者；晨于六二年六月十七日《光明》副刊《文学遗产》《林四娘的艺术处理》一文中曾谓林四娘抗清而死，曹雪芹于《红楼梦》中写老学士闲微媿媿词半回中肯定林，足征曹有民族思想云云。朱稿于同年八月写成，投给“文遗”编辑部，但“文遗”编辑旋以文长（其实不过五、六千字）为辞，谓拟刊于《文学遗产增刊》云云。半年后（六三年二月十九日）“文遗”编辑部又书面通知已将该文编进将要付排之《增刊》第十四辑，并请朱核对其文中之引文，朱当即如命办理，但今年五月又接信谓改编入第十五辑，并已付排，三个月内可出



唐弢藏书《影梅庵忆语》(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再版本)封面及版权页



1963年7月19日茅盾日记手稿第3页,内文有“拟将此稿转交唐弢”

书。但七月中又接信则谓《增刊》决停，原稿退还云云。此事前后经过一年，在此期间，《文学遗产》出过四十多期，文长在五、六千字者甚多，何以未稿推三迭四，终于退还？朱因此甚为不满，将稿寄我，要求公平对待百家争鸣云云。查“文遗”登刊藪文，确是冒失，而后又护短，不肯在“文遗”上刊出驳駁之朱稿，终于退稿，无怪朱愤愤不平也。拟将此稿转交唐弢，看《文学评论》上能发表否？晚阅书至九时，服药二枚如例，于十时半入睡。

8月1日：复唐弢信（唐信盖为朱南铤稿子而复我上月十九日之信也）。唐信谓《文学评论》非文史性质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拟介绍于其它刊物，然亦不能必其刊登，拟请我先询朱意，并请其谅解云云。又给朱南铤信，并附唐信供其参考。

8月3日：复朱南铤昨日来信，又给唐弢一信，仍然为朱稿刊登问题。

8月17日：八时半唐弢来谈半小时。

由此可见，茅盾收到了朱南铤的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么?》与书信，在信中朱南铤向茅盾先生说明了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作为文化部部长的茅盾表达了不满，“朱因此甚为不满，将稿寄我，要求公平对待百家争鸣云云”。

为此，茅盾第一时间想到了在《文学评论》担任编辑的唐弢，并致信唐弢附上了朱南铤的文章，很快唐弢回信表达了“《文学评论》非文史性质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的意见，为此

茅盾就此文章的问题分别致信朱南铤与唐弢，后来“唐弢来谈半小时”，想必也是为了此事。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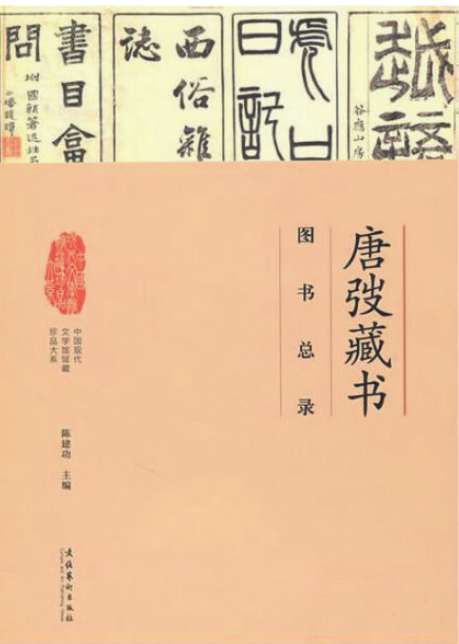
1964年底，茅盾卸任文化部长，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于年岁渐长与眼疾的加重，文章几乎搁笔，日记也越来越少，唯有1967年的两处提及了唐弢：

7月12日：他们仍在搜集关于左联的材料，我将过去（解放后，据说是文学研究所唐弢所搜集整理）收到的一份油印材料给了他们。

8月18日：十时许，有文化部联络站之杨家声、刘庆福两同志来访，找唐弢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稿，及周扬内部讲话打印稿。关于唐稿，我记得两个月前清理积存文件时看过，但误记为小开本铅印者，故当时只从此方面找，却找不到。

从记录中可以看到，茅盾两次提及唐弢编撰的作品，一本是关于左联的材料，另一本是唐弢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稿，可见后者一直为茅盾所收藏。

本文从茅盾与唐弢交往情景的发掘，试图发现一种作为现象的友情轨迹，它折射着作家的文化心态，也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与学术的诸多症候。（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关于郁达夫相关评价的几则史料

1985年10月15日，臧克家致信唐弢，信中写道：“昨天，看到《文摘报》上刊出你的一段谈话：为主编《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同志评价不当，自认‘罪责’，我甚感动。编‘文学史’、评价人物，十分困难！叫人人说评得完全公允，几乎不可能。”

那么，唐弢究竟是怎么自认“罪责”的呢？笔者暂时没找到《文摘报》的这段话，但却注意到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富阳文史资料》第1辑刊有唐弢1985年9月在富阳“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摘要整理稿，题为《过去评价达夫 未达应有高度》，该文不见于唐弢的各类集子，照录如下：

我今天来参加会议，主要是向达夫先生请罪来的。达夫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在交往中，很尊敬他。对于达夫先生这样一位作家，以往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听说讨论会中，大家提出，中学教科书选他的作品太少；大学教材，例如现代文学史对他评价也不高。在由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对达夫先生没有颓废之类的话，但也有不够高的毛病。作为大学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编写时规定，要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要采取大家能够接受的、已被公认的看法。凡是个人独特见解尚未得到公认的、暂时不写进去。这个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有副作用，因为它排除了“一家言”。记得在编写时，出于客观原因，大家对郁达夫有争议。当然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来负，因为我是主编。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富阳有一个郁达夫，这是富阳的光荣；浙江有一个郁达夫，这是浙江的光荣；中国有一个郁达夫，这是中国的光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无论中外，都这样承认。

我第一次见到达夫先生，是一九三四年，和见到鲁迅先生同一天，就是一月六日，在黎烈文请客的宴会上。以后有些来往，最后一次见面在万国殡仪馆，他从福建赶到上海，参加鲁迅先生的丧仪。

一九四六年我看到报上传说达夫先生失踪的消息，因为有事来过富阳，曾访问了达夫的二哥郁养吾先生，向他打听达夫是否有消息。养吾先生反过来也问我们有什么消息。因大家对达夫先生的去向很关心。那时，只知道失踪，并无确讯，

向他的家属询问，家属也向文艺界询问，都希望能得到一点确实的消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的第二节是“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其中这样写道：

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响。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郁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点。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这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某些文人如刘伶等的影响）。从《茫茫夜》以后，作家有意识地去写性变态心理，这使《沉沦》中所出现的消极成分一度有了发展，以至后来写出了像《迷羊》（一九二七年）那样绝对积极意义的作品……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环境下，郁达夫避居杭州，过着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这就有了《迟桂花》《迟暮》《瓢儿和尚》等短篇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人物形象比较清晰，文笔也能给人以舒徐清静之感，但它们对那种远离斗争的隐士式的生活却表示赞美和肯定，用很多笔墨去渲染乡居生活的所谓安逸和恬静，在思想上正好代表了作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种种倾向……他始终仰望光明，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失望，甚至颓唐。这正代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但他缺少投身于革命的激流，站到时代最前列的勇气，思想水平大体上停留在“五四”阶段，这又是他的短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杰出的价值，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从摘录的这些片段，就可以证明唐弢所言，“在由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对达夫先生没有颓废之类的话，但也有不够高的毛病”，实则不虚。

关于和郁达夫第一次见面的细节，唐弢在《记郁达夫》中讲得我非常生动具体，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文中有一段谈了他早年对郁达夫作品的喜好，颇为有趣，值得一录：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欣赏……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

关于拜访郁达夫的二哥养吾先生一事，唐弢1946年6月10日写有《在富阳——访郁达夫故居》，详细地记录了细节。当时唐弢和柯灵、太平洋旅行社的社长张邦铎一行三人拜访了养吾先生。“他是一个矮矮的老人，蓄须，挂眼镜；清瘦的面貌加上轻快的脚步，和达夫先生一模一样。他问起达夫先生

“请罪”与“心折”

——爬梳唐弢与郁达夫的“交往”过程

□宫立

的消息，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消息。一个月前从上海转到星嘉坡朋友的来信，依然毫无踪影，他叹息说：“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的声音里蕴藏着手足的悲痛，一个感情的网落下来，我们大家都沉默了，“我们希望郁先生没有成为‘古人’，早早归来，让朋友们卸下这一肩友情的重压”。可惜郁达夫早在1945年9月17日就已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唐弢的期待“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唐弢藏书中的郁达夫

2010年8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唐弢藏书·图书总录》公布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所藏24293册图书（期刊除外）的目录。翻检多达602页的藏书目录，从中检索得出关于郁达夫的书近70种，具体统计如下：

- 《沉沦》(泰东图书局1921年10月初版、1926年10月第8版)
- 《芜萝集》(泰东书局1923年1月初版、1926年7月第3版、1929年1月第5版、1930年6月第6版)
- 《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6年6月初版)
- 《小说论》(光华书局1926年1月初版)
- 《郁达夫文集》(开明书店1928年3月初版、北新书局1933年3月第6版)
- 毛边本《漱帚集》(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1928年10月再版)
- 毛边本《达夫代表作》(春野书店1928年1月第2版、1928年3月初版)
- 毛边本《寒夜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初版)
- 毛边本《鸡肋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0月版初版、1928年4月2版、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7版)
- 毛边本《日记九种》(北新书局1927年9月初版、1928年4月第3版)
- 毛边本《迷羊》(北新书局1928年1月初版、1928年9月第3版)
- 毛边本《恋爱之花》(开明书店1928年初版)
- 《在寒夜里》(世界文艺书社1929年6月初版)
- 《过去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2月第4版)
- 毛边本《过去集》(北新书局1931年7月第7版)
- 《她是一个弱女子》(湖风书局1932年4月初版、现代书局1932年12月初版)
- 《创作经验谈》(郁达夫等著，光华书局1933年8月初版)
- 《达夫自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9月第2版)
- 《几个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中华书局1934年3月初版)
- 《屐痕处处》(现代书局1934年6月初版)
- 《迟暮》(生活书店1934年9月初版)
- 《达夫所译短篇集》(生活书店1935年5月初版)
- 《迷羊》(北新书局1935年8月第10版)
- 《达夫游记》(文学创造社1936年3月初版)
- 《达夫散文集》(北新书局1936年4月初版)
- 《闲书》(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5月初版精装本)
- 《郁达夫文集》(梁季千编，国风书店1941年初版)
- 《达夫日记集》(北新书局1947年6月第2版)
- 《郁达夫游记》(上海杂志公司1948年11月初版)
- 《达夫诗词集》(郑子瑜编，宇宙风社1948年6月初版)
- 《郁达夫诗词抄》(1946年，上下两册，线装影印)

- 《南洋散文集》(郁达夫等著，求实出版社1951年6月第2版)
- 《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初版)
- 《郁达夫研究综论》(张思和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
- 《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 《郁达夫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 《郁达夫外传》(孙百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 《郁达夫游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 《郁达夫抗战文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 《郁达夫小说欣赏》(张思和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 《郁达夫评传》(曾华鹏、范伯群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 《郁达夫研究资料》下(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8月版)
-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初版)
- 《郁达夫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版)
- 《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版)
- 《郁达夫传》(郁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 《郁达夫传记两种》(小田岳夫，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版)
- 《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
-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 《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1月至1984年5月出版)
- 《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 《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 《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

唐弢的这些藏书里，既有郁达夫的创作，又有郁达夫的翻译，还有关于郁达夫的传记、研究专著、研究资料等，琳琅满目。同一种书，不止一个版本。光边本有，毛边本也有。最难得的是，有不少书并不常见，版本非常珍贵。可谓郁达夫文献的集大成。试问，有哪个收藏家或者郁达夫研究专家，能比唐弢的这些藏书还丰富？笔者期待有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能将唐弢所藏的有关郁达夫的这些书，汇集在一起，做一个郁达夫的专题展览。参观的读者，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郁达夫文献的多样，又可以领略唐弢藏书的丰富。

唐弢不但藏书多，并且对郁达夫的作品非常熟悉。所以他看到赵景深1949年编的《达夫全集》校样后，“曾经细心地替我补了不少篇目，都是散见在《北斗》《文学》《太白》《宇宙风》等刊上的作品。计有《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忏悔独白》《新年试笔》《怀鲁迅》《两浙漫游后记》《雪夜》《徒然草选译》《游园滴沥》《北平的四季》《日本的文化生活》《从鹿面传来的消息》《福州的西湖》《小品文杂感》《回忆鲁迅》等篇。”此外，关于郁达夫，唐弢1947年还在《时与文》周刊“文艺志”栏写过书话。由此，大概可以勾勒出作为文学史家和藏书家的唐弢与作为作家的郁达夫之间的“交往”过程。（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